

比较与探索

87
IO
183

56.47175
惺亭语言文学丛书

(第五种)

比较与探索

中山大学中文系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广州



376330

258

比较与探索

中山大学中文系主编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湛江日报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8.282 印张 18.4 千字

1986 年 10 月第 1 版 198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7339 · 24 / 定价: 1.35 元

259

前 言

才两年多一点，文艺理论教研室的老师们就撰写了两部论文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第一部论文集，题名《文艺论集》，在1984年中山大学建校六十周年的时候，作为“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论丛”之〔九〕，已经出版了。现在出版的这一本，是第二部论文集。两部论文集，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力求使文艺学的研究能够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实践提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这两部论文集虽然不打算面面俱到，其主题也不能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当前的文艺实践中，提出了不少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认真进行探索，然后给予回答。在这方面，第一部论文集已经做过比较多的工作，其中探讨过发展经济与繁荣文艺的关系，深入生活，历史题材的创作，和文艺的特性等问题，并且从整体上探讨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则性，在文艺领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等问题。在这个基础上，这一部论文集进一步探讨了文学观念的更新，创作方法的多样性等问题。当然，对于当前的文艺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既可以直接从理论上概括地加以探讨，亦可以专就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具体地加以探讨。因此，第一部论文集研究塑造新人形象的经验时，采取

分析一个作家的办法；这一部论文集探讨艺术表现的手法时，采取分析一部作品的办法。同时，这一部论文集还分析了两位台湾省著名作家的创作，从中探讨创作方法的演变以及作家的人格对创作的影响。借鉴这些经验，对于当前的文艺实践，也很有现实意义。

其次，无论是当前的文艺实践，还是文艺学自身的发展，都提出如何批判地吸收中国古代和外国文艺理论思想这个问题，要求理论工作者认真进行探索，给予回答。在这方面，第一部论文集所做的工作比较少，只从一个很小的侧面，探讨过如何批判地吸收印度古代的文艺理论思想。有鉴于此，这一部论文集显著地加强了这个主题的研究工作。关于钟嵘文学思想的研究，以及对上古至西汉时期有关艺术本质的理论的探讨，都是尝试如何批判地吸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思想。至于对柏格森美学思想的研究，以及对自然主义的文学思想的探讨，都是试图从一两个侧面来回答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当前应该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关系。

再次，当前文艺学自身的发展，也迫切要求加强对比较文学的研究。虽然比较文学在西方的发展，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在我国真正作为一个学科开展广泛的研究，还是近几年的事情。在这样的条件下，要系统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文学体系，无疑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需要脚踏实地去尝试。因此，两部论文集对此都给予应有的重视。第一部论文集有四篇这方面的论文，这一部论文集又有两篇这方面的论文，都是份量比较重的。其中，既有理论比较，又有创作的比较；既有比较研究，又有影响研究。至于比较的对象，既有古代的，又有现代的；但不论是古是

今，作为发展一个学科尝试，都是新的。

最后，这两部论文集还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向外国文学借鉴的问题。这同样是当前的文艺实践要求解决的问题。随着翻译作品大量涌现，在这方面应该做的工作本来是很多的，可惜这两部论文集，只接触到少数几个现当代的东方作家及其作品，留下一大堆工作，只好将来再完成。不过，提倡一下借鉴东方文学，而且注意现当代，也有一点现实意义。

这两部论文集，相对集中地体现了文艺理论教研室的老师们两年来进行比较和探索的成果；实际成绩如何，还有待实践加以检验。但是，这种努力，无论如何是值得肯定的。

编 者

1986.1.31.

目 录

前 言

※ ※ ※

- | | |
|----------------------|-----|
| (1) 四化建设中的文学观念更新问题 | 楼 栖 |
| (9) 论创作方法的多样性 | 邓志远 |
| (24) 试论东方文学史的分期 | 吴文辉 |

※ ※ ※

- | | |
|--|-----|
| (41) 《黄土地》引起的思考 | 陈培湛 |
| (55) 从感伤主义到现实主义
——对陈映真小说从《面摊》到《云》的
创作方法的探讨 | 吴文辉 |

- | | |
|---|-----|
| (78) 汲汲“首阳”志 倦倦“园丁”情
——论扬逵小说的思想特点和艺术风格 | 潘翠菁 |
|---|-----|

※ ※ ※

- | | |
|---|-----|
| (94) 钟嵘《诗品序》文学思想再认识 | 郭正元 |
| (110) 上古至西汉时期对艺术本质的最初探讨
——学习古代文论札记之一 | 邓志远 |

(116) 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美学观
——评柏格森的《笑》

潘翠菁

(158) 自然主义·真实·科学

唐正柱

※ ※ ※

(175) 试论《创世记》开篇创世神话的特色
——《旧约·创世记》神话研究之一

吴文辉

(201) 《战争与和平》与《三国演义》
史诗风格比较

易新农

※ ※ ※

(223) 论《洪泛的河》

张国培

(237) 美妙动人的诗章
——论诗琳通公主的诗集《小草的歌》

张国培

(246) 论努埃曼的小说

吴文辉

四化建设中的文学观念更新问题

楼 栖

近年来，文学评论显得相当活跃，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过去，大都限于对文学创作的评论，或对创作与评论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现在却进而对文学观念及其有关问题作理论上的探讨了。有人提出，文学观念要更新，文学研究方法要改革；文学批评观念也要更新，文学批评方法也要改革。这一信息引起文学评论工作者的热烈反响，这是文学评论开创新局面的一个标志。

(一)

文学观念要更新，文学研究方法要改革等有关问题，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开的。讨论这些问题，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以便摸清问题的性质及其来龙去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为变革现实的指导方针。在文学艺术领域内，要求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以便开辟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有了明显的变化，社会主义文学成为创作的主流。与文学创作相适应，文学批评观念和文学批评方法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在正常情况下，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学的研究，方法上也有

很大的不同。文学批评和反批评，学术讨论和争鸣，都依据新的原则和标准，显得相当活跃。所谓正常情况，是指文学批评作为文学问题来对待，而不是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即使这样，“左”的指导思想有时也占据支配地位，给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以一定的影响。例如，分析文学作品，着重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忽视艺术表现和艺术技巧；只谈阶级性，不敢谈人性；只谈阶级感情，不谈人的感情，如此等等。

此外，还有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以非文学批评代替文学批评。文学上的是是非非，往往和政治上的风风雨雨牵扯在一起。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风雨表。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胡乔木同志前些时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它“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以后几场文艺批判，都有类似情况。有的甚至以文艺思想批判开始，以政治定案结束。这种以政治批判代替文学批评，是以下列论点为依据，并从“左”的角度去理解的：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与此相适应的是文艺批评标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而政治标准第一又往往随着政治风向而偏移，成为政治标准唯一，甚至任人随意而定。例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作品，一九五六年发表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文学评论界的重视。可是，第二年反右风刮得紧，它们都给打成“毒草”，连作者也给打成“右派”。前几年落实政策后，这些作品又成为《重放的鲜花》。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依据的都是政治标准第一。由于政治风向不同，政治标准的行情就未免大起大落了。

十年动乱，四害兴妖，极“左”思潮发展到登峰造极。他们祭起“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黑旗，挥起“文艺大批判”的铁棒，到处乱砍乱杀，且明目张胆地利用小说、电影进行反党活动，他们妄想造成一个无声的中国，结果造成遍地火山，自掘坟墓。

文学批评开展的正常情况与不正常情况，在十七年间有时起伏交替。正常情况的延续时间长，而不正常情况却影响大。最后来个十年浩劫，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从“左”的思想发展为极“左”思潮，毕竟有一条脉络相承，贯穿在文学观念前后变化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十分深刻的教训。

(二)

历史无情，物极必反。四害覆没后，文艺批评充分发挥了战斗的作用，揭露“四人帮”的各种罪恶，清除他们散播的各种流毒，解放思想，探本穷源，认清极“左”思潮的危害性。一批中年作家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一批青年作者从基层中涌现出来。这两批生力军长期生活在边疆、在工厂、在农村，他们对现实生活有深入的观察和体验，思想感情和人民血肉相连，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他们的创作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他们广泛揭露“四人帮”的各种罪恶，描绘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以及他们悲惨的遭遇，反抗的灵魂。他们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冲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各种禁区，写悲剧，写爱情，写伤痕，写阴暗面，激动了广大青年读者，引起了文艺界的强烈反响。绝大部分同志肯定这类创作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历史风貌，表现出时代精神，这是文学创作上的大突破。这些创作和评论，在文革前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这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

观念，多年来是受排斥的。即使是在文革后，也还有人对此类作品的历史内容和现实意义表示怀疑，甚至有人否定社会主义社会有悲剧的存在。可见“左”的文学观念影响之深。

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从极“左”思潮中解放出来，是付出了惨痛代价的。突破“左”的文学观念，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长期以来，文艺被规定为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年代文学经验的总结，适用于一部分文学作品，不是文学的普遍规律，但它一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成为处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要原则。文艺既然处于政治的从属地位，那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直接影响到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得不到健康的发展。文艺不能干预生活，政治却随时可以干预文艺；文艺只许歌颂光明，不许暴露黑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连“写真实”也成为一种禁区。这就大大削弱了文艺反映现实的功能。其实，暴露黑暗也可以成为反映光明的折光，问题不仅在于暴露什么，而且在于怎样暴露。如果暴露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光明而又暴露得深刻，这比浮浅歌颂光明的作品要更有意义，也更为有力。这样的作品在过去的文学中是屡见不鲜的。过去，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占据支配地位，造成文学批评上的许多失误，用非文学批评代替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也给弄得异常模糊了。

暴露四害罪恶的文学，有人叫它“伤痕文学”，有人叫它“解放文学”。那些暴露得深刻的作品，塑造了不屈的灵魂，使人鼓舞向上。它们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更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观念。由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正常化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也得到健康的发展。从“解放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这一题材上的发展、变

化，反映了社会主义现实的伟大变革和逐步深入。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列宁早已作了明确的论述：“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列宁同时又指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小平同志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辞》中，引述了这段话并作了充分的阐述，作为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原则，从而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朝向健康的道路发展。多年来忽视了“绝对必须保证”两个“广阔天地”的重要原则，因而给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观念带来了很大的政治束缚。

（三）

这几年，要求更新文学观念、文学批评观念等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普遍。不少同志介绍了西方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新的探索。文学评论刊物多起来了，打破了沉闷的局面。这也许是改革浪潮涌入文学评论领域的一种表现吧。

随着经济改革潮流的到来，出现了一个文化改革的潮流。文学期刊和文学小报，象雨后春笋，纷纷出土，盛况空前，情况复杂。其中多数是健康的、好的，但也有一些不健康的、不好的。有的用庸俗低级的趣味，黄色下流的读物，招徕顾客，吸引读者。有人对此提出批评，有人反而为它辩护。还有人公开主张“文学商品化”，为它制造理论根据。列宁早已指出，“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文学商品化”却是要为个人或集团赚钱。为了赚钱，就要适应商品市场的需要。那些趣味庸俗、情调低劣、宣扬黄色下流的读物，就大量涌入市场。这种文学观念，无

非是要回到资产阶级文学老路上去，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麻醉青年，毒害读者，把他们引上犯罪的道路。这一严峻的现实，令人触目惊心。因此，讨论文学观念、文学批评观念的更新问题，不能离开当前文学现状的复杂情况而空谈更新，否则就会迷失方向。

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有人怀疑，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建立于一百多年前，现在是否已经过时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在发展道路上有过许多曲折，是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指导有关。这样理解问题显然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是不断发展的。我国的革命文学运动，一向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作为指导方针。它有一个发展过程，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既有许多建树，也走过一些弯路。小平同志的《祝辞》，对建国三十年来的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祝辞》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的一个发展。它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这是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出发，对文学提出的新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指导原则。几年来改革文学的创作实践，充分证明这一指导原则的正确性。

现实生活异常广阔，创作题材异常丰富，革命作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运用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样的艺术技巧，以乐观的情调、向上的精神，反映现实斗争，塑造各种人物，培养人们的审美理想、道德情操，给人

们以美的享受，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的需要。

革命作家要有充分的创作自由，才能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这取决于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客观条件是指政治上要有充分的保证，主观条件是指作家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如果无产阶级政治对文学创作不是用正确方针进行指导，而是用行政命令进行干涉，那创作自由就是一句空话。如果作家缺乏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就可能把创作自由当作自由化的跳板，象有些人那样，大量制作低级庸俗、黄色下流的读物，培养读者低级庸俗的趣味，为他们推销“商品文学”打开市场。这种恶性循环如果任它发展下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会落空。

四化建设的过程，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并且经常反映到文学问题上来。文学观念的更新问题就是其中一个例证。社会主义文学要为四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而有些同志却要把文学作为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金钱观念浓厚了，四化观念淡薄了，就会变社会主义文学为资本主义文学。

此外，有人为了更新文学观念，抛开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各种文学观念，不顾社会主义文学和资本主义文学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任务，有意模糊两者的界限。

社会主义要发展，文学观念要更新。但这种更新不能离开现实发展的土壤，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文学观念，是随着革命现实的发展而更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文学观念，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我们都应当借鉴。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一概拒绝。全盘西化或自我封闭，我们过去是吃过大亏的。

有一部分同志心存偏见，认为洋货要比土货好，西方的文学观念要比中国的文学观念新。为了追新猎奇，急于照抄概念，生搬硬套，似懂非懂，烦琐晦涩，莫测高深。这样更新文学观念，无异故弄玄虚。

文学总是现实的反映，不是直接反映，就是间接反映。因此，探讨文学观念的更新问题，不要从概念出发，而要从文学现状出发，从反映四化建设的文学需要出发，要有明确的目的性，要使社会主义文学对四化建设能起更大的促进作用。

论创作方法的多样性

邓志远

创作方法多样性的问题，似乎是一个早已不成问题的简单的问题了，各种文学概论的教科书几乎是众口一词。然而遗憾的是，几乎每本教科书在谈及这个问题时都语焉不详，使人不得要领。有鉴于此，我不揣浅陋，专文论述一下这个问题。

—

创作方法多样性的问题，其实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理由之一是，创作方法多样性既有外部的多样性，又有内在的多样性。

所谓创作方法，就是作家从事创作时按照一定的观点再现社会生活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基本原则。由于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作家在从事创作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就使文学史上的创作方法呈现出了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的形态。

早在古希腊时期，文学反映生活就出现了两种基本倾向：一种是“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描写①”的原则从事的创作，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和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阿卡奈人》等；另一种是“按照人应当有的样子来描写②”的原则从事的创作，如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